

梅洁:好散文在时间的深处生命的疼处



人物简介

梅洁，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人，国家一级作家协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现已出版、发表《爱的历程》《生存的悖论》《一棵苹果的忧伤》《泪水之花》《飘逝的风景》《西部的倾诉》《大江南北》《梅洁文学作品选》（七部集）等诗歌、散文、中长篇纪实文学33部集700余万字。曾获全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三届、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及优秀奖等，2017年全国首届“孙犁散文奖”，河北省“首届孙犁文学奖”，第八届北京文学艺术奖，及《十月》《长城》《作家》《黄河文学》《散文选刊》《中国作家》《人民日报》等报刊文学奖，共计80余种文学奖项。《童年往事》《倾听水声》《梅兰的忧郁》《白发上津城》《山苍苍，水茫茫》等多篇散文、纪实文学入选全国大、中、小学语文读本、课本和教材。现定居北京，从事专职写作。

“

徐芳:您是散文高手,同时也创作了大量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对于“散文”这一形态本身较为模糊的文学样式的界定,学界各家历来均持异见,虽然已有不少大家的高论言说,但是中国散文理论体系的建构依然处于尚未体系化、理性化、范式化的存在。鉴于当下存在的状况,您如何看待之?梳理成全方位、理论化的文本形式存在的难度和问题,您所认识的散文,是否将报告文学、散文以及各类文字小品囊括其中……另外在散文的实际发展中又是否存在某些缺失与忽视?

梅洁:正如你所说,中国散文理论的体系建构依然处于尚未体系化、理性化、范式化的存在。我以为真正把散文这一文体体系化、理性化、范式化,是很难的。我甚至想,哪天若真把这类最易接受、最易表达、受众最多的文学样式“三化”起来,散文也就死了!

在我39年的创作历程中,我起初写诗,1992年《诗刊》发表我最后一首诗后,我几乎不再写诗了。其时,写诗的同时我一直在写散文。关于“创作了大量重大题材报告文学作品”,是褒奖我了,因为比较而言,我的“量”不大。应该说,我至今认为我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一直偏重于散文的写作。我还固执地认为诗与散文的写作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然而,我要说,是报告文学给了我无尚的荣誉,是这一最具真实品格的文学质地,成就了写作者的光荣和生命的质地。

鲁奖获奖作品《西部的倾诉》,应该说以散文文化的表达和散点透视式的结构,企望从历史、文化、教育、经济、人口、环境等多侧面揭示一个人类生存的怪圈,那就是中国西部贫困带来的教育缺失、教育缺失,尤其是女性教育的缺失导致的野蛮与蒙昧,从而衍生环境遭到根本性的破坏,而环境的被破坏使发展中国和中国西部更加贫困。这是一个生存陷阱,或许我报告了这个“陷阱”。

1998年,我在中国西部走了数万里。从贵州到甘肃,从甘肃到青海、从青海到辽阔的西部高原行迹。我一直在此寂寂的西部高原行走。我已经明白,我行走的理由不再是为了满足文人的雅兴,我是在探寻与我为作命题有关的人文与自然的实证。我数次穿越沙漠、戈壁、高地,我反复翻越海拔几千米的青葱高原,我看到了可怕的丹地褶皱和大地再肆虐,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恨与怜悯;我在风沙弥漫的毛乌素沙漠和腾格里沙漠里行走,体验着人类艰难的企盼和生存……没有这样艰难的实地行走,我不会产生这部作品。

与此同时,我用20年的时间,关注着中国一个重大水利工程“南水北调中线”背后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汉水、丹水两岸80余万移民都是我的父老乡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调水过程中,在调水源头我的家乡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悲壮的沉没,泛起的眼泪,重铸的血汗,无数的焦虑与困惑……2005年,我沿汉江、丹水走了100多天,之后又转身沿京、津、冀极度干旱的北方走了100多天。最终我把对中国水环境的深重忧患,无数的焦虑与困惑,汉江的忧患,对中国移民之命运和生存的忧患,都记写在45万字的《大江北去》一书中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我用20多年时间,以140余万字的篇幅,完成了一个迄今世界最大引水工程背后人的命运、人的牺牲与奉献的书写,即“汉水移民三部曲”。

我的报告文学写作仅仅如此而已。我对一些朋友说,那是我的大散文,或者说,那是我对散文创作的一种更广阔的深入和更深度的创作补充。我说这些意思,是把报告文学、散文、随笔、书信都归为散文的范畴,我觉得是一种文体势能所趋,只有散文

这种文体能收留、包容这些心灵和思想的寄语。我认为它们之间的融合和差异,写作者都会有自己的把握。报告文学叙事的辽阔厚重,散文对人类心灵的慰藉,散文对世相人心的讽喻与砥砺等等,一个相对成熟的写作者,自应有恰适的掂量。

问题在于,现实中人们每每降低、忽略散文创作的审美品质;常见的是,事无巨细地把生活的琐碎轻轻率、很不严肃地交付给散文;习惯于散文的小位置、小舞台,对人生、人性以及人生的生存思考散文显得清浅而单纯,我们有意无意在散文创作中放弃或减弱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深切关怀,放弃对人性全面以及民族、文化、历史的注视。即便偶尔注意了,但一想到散文文本本身——我们已非常习惯并主观地把散文对生活的切入点限定在不承担大文化背景的面——我们思索的深度立即受阻,批判的锋芒有意内敛。女人们在散文里常常是倾诉一己的悲欢,男人们在散文里常常是一味地插科打诨,于是,社会的大关怀在散文里大踏步后退了。

“

徐芳:关于散文创作有句话,叫“形散神不散”,这倾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主导了散文艺术的创新性探索与散文审美的创造力,那是否亦会同步带来散文审美层次与创作的模式化?

“

梅洁:“形散神不散”作为一种创作理论抑或方法论,仿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一段讨论和争议,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散文的模式化写作给予了很好的辨析和冲击,对后来中国散文浩浩荡荡的发展,给予了文体的松绑和创作主旨与精神的解放。

我的文学创作始于1980年,赶上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历史新时期,也曾听到了这场“形散神不散”的讨论。但是这场讨论并未十分在意。我大学是学经济的,毕业从事十多年经济工作后突然改行换道,选择文学,应该说那是在不谙文学为何物的状态下开始的一种文学冲动。对于文学理论更是无知也无感的。“形散神不散”的作品是什么样?批评“形散神不散”那就是倡导“形散神不散”么?那样的作品又是什么样?

也许是不在意这些理论的束缚,我就洋洋洒洒写我自己的。应该说,当年那件件几万字是受情感的驱使,是受当下情绪所形成的那个“我”的主宰。于是在形式上是不拘一格的,是总在变化的。写某篇作品时我是在伤心地抽泣,那我就声泪俱下地写,有时则在词语后面连打三个感叹号,比如《那一抹蓝色山梁》;写另一篇作品时我在心在极度地疼痛,那我就痛彻心扉地写,比如《我的丈夫走在那片青山绿水间》《不是遗忘的遗忘》;而写述说而忧伤的回忆,我就情深意长、娓娓道来地写,让“泪水盈眶”但不让它流出来,比如《童年旧事》《福寿儿》;又有些作品,是要用很强的诗意思调,需要简约抽象,那就奔放吧,辽阔吧,排排吧,一味三叹吧,有意叠层吧,甚至连句不标标点吧,比如《爱的履历》《通往格术之路》《泪雨霏霏一杯酒》……

因为受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的深刻影响,我后来还写了不少历史文化的散文,比如《商道》《泥河湾》《驿站》等,那是一片地绝、痛楚的“泪泪”和“泣血”。丈夫惨逝的场景是我永世的痛苦,他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上路”了,在那个天人之间永世分离的时刻,我目睹了亲人“死不瞑目”,至今想起我都肝肠寸断、心碎欲裂。

“我一生一世心疼的那个家因着丈夫的离去已不存在了,没有什么能引渡我内心深处的痛苦。望窗外泣血的夕阳,我伤疼如斯……”我这样

那样空泛,它的茫茫的历史感、悠远的命运感,执着的对民族精神之根的追思,全都源自生命内在的激情。”

我想,一个对散文创作认真负责的写作者,真正给予自己生命的应是永远的真诚与激情,在真诚与激情的写作中,还需要去考虑“神散”还是“神聚”?一篇真正有慰藉心灵品质的散文,“神”能“散”到哪里去?而一味浅薄地图解时代的散文,“神”越“聚”越伤神,越做作、越露露真性情,每一个时代的痕迹都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那烙印是烙在作家心灵上的,是无法摆脱的,即自己的写作只能是自由的外部环境所赋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的单一模式是那个时代的赋予,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多元文化的涌进,文化语境的敞开,使中国散文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散文作品的灿烂、绚丽,应该说已冲垮了单一“模式化”束缚,散文的审美层次已大踏步更新。所以,“形散神不散”的争议,已经没有太多意义,它不再会成为文学写作者的“心障”和“文障”。

“

徐芳:所谓女性散文,就是把自己对生命个体、文学创作的理解和梦想找到诗行字间,尝试着将其对生命、生活和社会的思考纳入到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观照之中;也可以说,这是更为直接地表这个体心性,是一种放开自己的写作,这样的散文作品,更清静地体现了自己的身影、体验、记忆与感情,比如您写丈夫的一组作品竟如同“落泪”?

“

梅洁: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伤痕文学的崛起,散文的写作也悄然出现。许多写作者在抚抚历史的伤疼时,不经意间触及到了人类情感的共通处。或者换句话说,写作者在抚抚自身心灵的痛处时,不经意间触及到了历史的伤疼。中国女性散文在这个时期呈现出很明显的性别特征。由于长期的社会角色认同和传统规范的压抑,使女性和自我价值开始觉醒。一批女作家,开始了群体性的自我诉说。她们从散文中找到了表达自己、寄托心灵的深刻方式,她们率真而淋漓,她们“真诚的自我表白强烈冲击着旧散文清静那个伪伤,而呈现出女性柔美的个性”《蔡江散》《梅洁散文论》。

无论女性面临怎样的生理压迫和精神痛楚,她们对自己处境与情感的深切体味,在以散文写作深入心灵困顿的同时,也在深深凝视和探求着时代人的精神出路。

应该说,我一直很深深地要挟在女性情感散文写作的潮流之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爱的履历》《这一片女儿的情结》《因为说起三毛》《女人:爱就爱得傻一点》《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等,都是在依认“这个不尽如人意、不尽完美的男女性世界,自然女性的处境、女人的生命意味,而依然要做‘有追求、有事业、有爱、有良好的品格’的女人”的诉说。

十多年前,我挚爱一生的丈夫惨逝在昆明至北京的列车上,之后我写下的《我的丈夫走在那片青山绿水间》《泪水之花》(不是遗忘的遗忘)等,那是一片地绝、痛楚的“泪泪”和“泣血”。丈夫惨逝的场景是我永世的痛苦,他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上路”了,在那个天人之间永世分离的时刻,我目睹了亲人“死不瞑目”,至今想起我都肝肠寸断、心碎欲裂。

“我一生一世心疼的那个家因着丈夫的离去已不存在了,没有什么能引渡我内心深处的痛苦。望窗外泣血的夕阳,我伤疼如斯……”我这样

写着。“你的离去是对我幸福最致命的打击,我至今无法安慰你也无法安慰我自己。我知道我走不出悲痛便没有快乐可言,但没有什么可以化解我内心深处痛苦。真正的悲痛是化不作力量的,‘化悲痛为力量’的教义对我没有意义。”我这样写着。

“亲爱的,在纪念你的时间里,悲苦的泪水打湿所有的时间……”我这样写着。

我给终为女,女性散文这种敞开心扉,对生活对情感对命运的痛痛淋漓地写作,是对中国散文的一种审美贡献。

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好散文在时间的深处,在心灵的痛处”,至今深信不疑。

“

徐芳:您为什么写作?对艺术的追求,即是人生的升华?是以个人和群体融合、个人和人类融合、个人和宇宙融合,以此来感悟世界的奥秘、人生的真谛——构建审美情感并与之同构?

梅洁:我之所以断然放弃了大学五年经济系本科的专业,放弃大学毕业后从事了十多年经济工作而改做文学,那实在是我的心灵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一定要穿越肉体、穿越时空,穿越苦难、穿越时空与山脉而不管不顾地发出来,那必定是命中注定了。

如你所问,我也常常问自己:是什么让我开始了写作并持续地让我进行着这寂寞的劳作?许多年里,我视写作为心灵的寄托,写作是这世上唯一能永远不厌其烦地听我诉说情感的朋友,能心疼地看我流泪的朋友,能真心地为我高兴的朋友。我活着,就朋友般与我高兴的朋友;我死了,就信任我对这个世界的一份眷恋。我相信爱我的人和爱我的人会因为这份眷恋而感念着一颗善心。我就这样陪伴着我的写作。

卡夫卡曾说:“握笔者述,是一种祈祷。”我想,对艺术抱有宗教般的虔诚之心,总能在成就我们一二吧!应该说,是在最近40年的悄然写作中,文学伟业的诱惑携带着我的心灵之光在默默前行。

我是一个职业写作者,许多年来,我都把手中的笔视作丈夫手中的锄头,像农人那样虔诚不惰地耕耘,做一个真诚的劳动者,成为我平生的愿望。然而,随着写作时间的延伸,我发现:写作是一种滋润和充实,它使我的生命质量变得越来越高。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因为写作,我总在感念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无论是爱与恨、希望与失望、困境与顺境、幸福与苦难都让我贴近,都让我与流涕中。在这无数遥远而贴近的感念与流涕中,一颗原本麻木的心变得多愁,一双原本愚钝的目光变得过去的时候了。

因为写作,我开始不断审视人类和自身,包括生存、命运、历史、自然、现在、未来,包括哲学、宗教、艺术、人性……审视的过程是不断学习、积极的过程,是不断向真向善向美的过程,是精神不断受洗礼和提升的过程,当所有的过程渐变为信仰、自律、宽容、爱变为谦逊、善良、公正等诸多美德时,我想我的生命应该是有意义的内容:

因为写作,我们一天天增长着对社会道义、责任的担当,对别人命运的关注和悲悯,对心灵与精神追求的力量……

当写作如此地融合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时,我想,它即使不救这个�界,但它肯定能救我们自己。

(转自上海《上观新闻》)

ROYAL WINE 买真酒 到华酒城 免费送货 电话 4000-179-179